

预算的建构力： 突破中国发展困境与陷阱

YuSuan De JianGouLi:

TuPo ZhongGuo FaZhan KunJing Yu XianJing

YuSuan De JianGouLi:

TuPo ZhongGuo FaZhan KunJing Yu XianJing

◎ 陈龙/著

YuSuan De JianGouLi:
ZhongGuo FaZhan KunJing Yu XianJing

YuSuan De JianGouLi:

TuPo ZhongGuo FaZhan KunJing Yu XianJing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预算的建构力：突破 中国发展困境与陷阱

陈 龙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预算的建构力: 突破中国发展困境与陷阱/陈龙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41 - 3756 - 9

I. ①预… II. ①陈… III. ①国家预算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1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3458 号

责任编辑: 刘 瑾

责任校对: 刘 昕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邱 天

预算的建构力: 突破中国发展困境与陷阱

陈 龙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1 印张 200000 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756 - 9 定价: 3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序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发展之中伴随着诸多矛盾和问题，由此使未来的发展面临一些困境和陷阱，应对这些困境与陷阱的出路在于加快国家建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预算远不仅仅是简单地分配政府的财政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塑造和构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推动治理创新，对于国家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当代最负盛名的美国预算专家艾伦·希克所言：“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

一

任何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现代性命题。当今中国取得巨大成绩，以及面临的诸多发展问题，无不与其有关。中国的现代性，既具有世界意义，又兼具自身特点。中国实现现代化超越，必须在反思西方现代性基础上，求解自己的现代性，实现外源性现代性向内生性现代性转化。这是一项对中国发展极为重要的思想任务，事关中国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成败。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占据思想高地，并在与西方文明、制度的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实现复兴与超越。

何谓现代性？笔者认为，“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整体结构或秩序的性质和状态，它生成、发展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是特定人类文明形态下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高度抽象。由于现代社会整体结构又可大致分为社会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因而它可以区分为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现代性”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社会发展经验的概括，也包括人们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表达和理性判断。“现代化”则是构筑现代社会的动态过程，即现代性在实践层面展开，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充实的过程。对现代性认知的差异，将会导致不同的现代化选择方案和实现路径。

现代性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观点形成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虽然现代性涵盖内容较广，并且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体系，其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时截然不同，但其精神

实质却始终贯穿于现代性形成与发展之中。笔者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义归结为理性、主体性原则、自由、批判性、物质性五个方面。

现代性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服务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因而，“现代性”具有历史性和区域性，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标准。虽然现代性在某些方面上表现为传统的断裂，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相反，二者紧密联系，并相互促进与生成。一个适合本国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是把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基本要义较好融合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实质是属于一种新的内源性现代性，与单纯的外源性现代性有着很大区别。人类发展史表明，与本国文化传统结合，生成内源性现代性是一个国家快速、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外源性现代性虽然也能带来一定的发展，但发展的动力与后劲往往不足，并且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较大。

当今中国，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成就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丛生，发展的理念、愿望与现实出现了一定偏差，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化和非理性，即出现了现代性困境。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中国自身的独特因素，二者叠加导致了这一困境。随着社会发展，启蒙现代性却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它的初衷，逐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为现代性困境的产生埋下了种子，如理性的分裂与蜕变、主体性原则的扭曲、物质性的庸俗化、对自由的追求异化出不自由的新枷锁。

走出现代性困境，就必须构建一个传承中华文明、符合实践变化，而又体现时代价值的新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法等思想互补互动、相映生辉，形成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虽然中国没有最早产生诸如西方启蒙时代的现代性，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因素，则能弥补西方现代性内在缺陷，降低或消除其负面效应。实现外源性现代性向内源性现代性的转化，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也是化解现代性困境、解决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为此，应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子予以融合，形成新的“和庸现代性”。这一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及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坚持中庸之道，摒弃二元对立思维，以合作共识、利益制衡突破改革困境；以内在的主体德性提升和外部的制度建构为基点，构建中和的理性体系；破除狭隘的物质主义观念，实现人本发展，提升人的可行能力；建构共同体与自由的共融关系，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性自由的协调统一。

二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主题，实现国家复兴和超越，离不开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一些突出

困境，如协调与稳定性困境、公共理性阙如等引起的社会治理困境、利益整合困境、政府角色困境、国际困境等。同时，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是一种急剧变化的复杂过程，呈现出复合性、整体性、迅速性、两重性等特征，社会优化与社会矛盾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弊病共存。未来的国家发展面临着“低能力国家”陷阱、“低质市场经济”陷阱、“民主形式主义”陷阱、“非理性民粹主义”陷阱、“塔西佗”陷阱等诸多陷阱。能否突破这些困境和陷阱，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应对困境与陷阱的出路在于加快国家建构，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使转型有序、平稳，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大的框架上来看，我国国家治理的架构体系应主要涵盖三个维度：强化市场型政府、公平竞争型市场和积极合作型社会。在这一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和目标体系下，国家建构的重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边界与作用方式。要超越传统观点，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整体中去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以“政府比较优势”取代“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边界和作用方式的界定标准。二是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消除公共权力异化，最为关键的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规范机制。公共权力制约与平衡，主要来自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个层面。三是公共治理创新。需要实现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变革，培育负责的政府和负责的公民，构建“政府——社会”新型合作关系，缩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四是社会合作共识与公共理性。合作共识可以增强社会的韧性稳定、提高运行效率，是现代良序社会生成的重要因子。然而，“理性困境”阻碍了合作共识的形成，需要以公共理性破解这一困境。为此，国家建构的一个重点就是培育公共理性的实践平台和有效媒介。

三

政府所有的功能及其运转都需要预算支撑，政府的所有行为也必然都会反映到预算上。在一般意义上，公共预算通常被理解为政府配置资源或理财的工具。实际上，预算远不仅仅是简单地分配政府的财政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塑造和构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助于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预算在本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公共权力，进行利益分配和协调的政治过程。除了作为效率工具、公平工具和控制工具，预算还可以成为合作共识和公共理性的“培育场”，在良序社会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预算一旦经人大批准予以执行，则就具有了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实际上是为政府经济行为“立法”，起到了“宪则”的作用。正是通过“预算宪则”，实现了预算对经济、政治和社

会秩序的建构。预算的这些内在功能和建构作用能否发挥，取决于预算制度的设计及改革状况。

六十多年来，我国预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基本符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制度改革，预算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这些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在政府行为控制上，虽然预算的作用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其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公共治理方面，预算的作用仅是刚刚开始体现，未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效率，是前一阶段预算改革的主题，但是又是仅仅着眼于效率和一些技术细节性的改进，超过某一阶段之后，效率反而提升得很慢，未来的预算改革将进入更为综合、更为系统的阶段，一些潜在的矛盾凸显，利益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必然远远大于之前。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拓展公共控制和提升政府能力、推动公共治理创新应成为未来预算改革的三大任务。根据预算改革的三大任务，针对预算制度中问题和不足，未来我国预算改革的重点在于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中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预算权力体系、打造完整持续的“大预算”、优化预算的编制、强化预算绩效、构建预算协商与参与机制等。这些预算改革的基本框架与重点，并非齐头并进、一蹴而就，而是要把预算改革放到我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适时分步推进。

预算的控制机制和协商参与机制，是既是未来预算改革的关键点，也是难点需要处理好诸多问题。例如：预算的控制如何与我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如何通过预算权力的优化配置提升政府能力？预算的协商与参与如何促进社会稳定，而不是相反？

预算发挥其建构作用是以预算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行使为基础。当前我国预算权力结构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限制了预算建构力的发挥。为此，需要在现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从预算的分权与制衡、预算的分工与合作、预算的委托与代理，以及预算的问责等角度，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对预算权力进行调整和优化，建立“四位一体”预算合作与制衡新机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作为信息中介，预算构建了政府与公众更为真切了解双向需求的桥梁。作为物质中介，预算通过对公共资源的配置，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有了更为实在的“抓手”，满足公众的社会存在感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利于培育公众的责任意识和参与理性，弥补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公众的政治冷漠及其他诸多弊端。以预算的信息表达与协商，实现政府和公众偏好的双向传递，在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意见形成”过程，使社会合作各方以理性的表达方式代替非理性的表达方式，通过利益调节、追求激励相容（共融）与公共利益，逐渐走向公共理性。发挥预算的内在价值，以预算为信息中介和物质中介，打造“政府——社会”新型合作方式，缩短国家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由“公共管

理”到“公共治理”、培育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极公民，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公开，构建符合我国制度特点的预算协商和参与机制，注重防范各种风险，加强与其他改革的协调和配合。

陈 龙

二〇一五年八月

前言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中国能否顺利完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握住这一节点。在这一节点上，我国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陷阱，未来国家建构的任务更加艰巨、更为紧迫。长期以来，预算作为效率和控制工具，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政府控制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预算在其他方面的功能，如推动治理创新、构建韧性可控的社会稳定机制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

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追本溯源在于现代性的问题。因此，本书以现代性为逻辑起点，分析我国的现代性困境，提出了应对方案。然后，研究了我国发展与转型中存在的困境和陷阱，提出加快国家建构的框架和要点，并将加快国家建构、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指向预算——预算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具有极为重要的建构作用。在对预算功能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预算建构力的状况，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提出了诸多改革的建议，但对于当前我国地方中的一些改革和试点的效果并没有做很多的实证分析，更多的是从预算哲学的视角，对预算的功能和潜在价值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制度特点，提出相关的改革建议。对于改革的试点状况和具体案例，本人将在另一部专著《预算治理：通往繁荣和稳定之路》中作以详细论述。

感谢在本书写作和出版中给我提供关心、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亲人，因人数众多，不能一一言明，但感激之情永存心底。在本书写作中，本人查阅了大量专家、学者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论文中是否提及，也不论作出何种评论，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给了我启发和灵感，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涉及的主题宏大、领域宽广，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于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有所欠缺，因此，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 龙

2015年8月

目 录

第一篇 发展困境、陷阱与国家建构

第一章 现代性之思辨	3
第一节 现代性：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思想命题	3
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与发展	10
第二章 中国的现代化求索及现代性困境	20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0
第二节 中国现代性困境及求解	30
第三章 我国发展困境与陷阱	45
第一节 发展困境	45
第二节 发展与转型陷阱	52
第四章 应对困境与陷阱的国家建构	58
第一节 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架构	58
第二节 当前我国国家建构的重点	61

第二篇 预算的建构力：理论与现实

第五章 预算的本质及建构力	79
第一节 预算的本质	79
第二节 预算的建构力：预算宪则	86

第六章 中国预算改革及其建构力的审视	91
第一节 评判预算改革及其建构力的基本维度	91
第二节 中国预算制度发展与改革的简要历程	93
第三节 中国预算改革及其建构力的分析与评价	107
第七章 中国预算改革“路线图”	111
第一节 未来中国预算改革的理念和主要任务	111
第二节 未来中国预算改革的基本框架和要点	115
第三节 未来预算改革的实施战略	121
第八章 优化预算权力结构：合作与制衡	125
第一节 优化预算权力结构的逻辑	125
第二节 优化政府系统预算权的合作与制衡机制	130
第九章 预算治理创新：缩短公民与国家的“距离”	138
第一节 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	138
第二节 培育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极公民	144
第三节 预算公开：治理创新的基石	148
第四节 预算协商和参与：“天堑变通途”	156
主要参考文献	161

第一篇 发展困境、陷阱与国家建构



第一章

现代性之思辨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里，“现代性”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思想明珠，它对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历史文明产生的影响，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绝无仅有。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难以脱离其影响。然而，“现代性”又具有历史性和区域性，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标准。对“现代性”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有利于厘清我国实践中的困惑，使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路径推进。

第一节 现代性：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思想命题

一、何谓“现代性”？

“现代性”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现代化”等词汇，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等各类文献中，都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但对于其内涵，人们往往产生不同的理解，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因此，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時候，时常会出现令人困惑不已、无所适从的状况，这显然不利于形成共识、消除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错误认识。

“现代”通常首先被认为是一个时间概念。从广义上而言，“现代”通常是指与“过往”相对应的时间区域，即相当于“当今”、“今天”、“当前”等词语所指的涵义。从狭义上而言，“现代”是与“古代”相对应的时间区域，因而常特指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时期。虽然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出现较早——源于公元4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来甚至一度成为基督教官方用语，但大多数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现代”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然而对于“现代”的理解，决不能仅限于时间概念，在其规定性上应包括对传统的超越——这一社会性质变化的内涵。例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是指世界在内容上超越了自己的过去，突破了

传统社会的主客观机制，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①。

“现代性”最初是在纯艺术的范围内被使用，后来广泛应用于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但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② 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必然导致人们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多样性，甚至有时出现相互对立和冲突的认识。基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视角，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给出了多种解释。例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祛魅”，即神圣的世俗化过程，现代性的核心是世界的理性化。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 ”^③ 吉登斯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④ “现代性是指大约从 17 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⑤ 哈贝马斯从对黑格尔的时代意识分析入手，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并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⑥ 杜维明认为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

总体而言，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在三个层面^⑦：第一，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现代世界”；第二，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社会思潮；第三，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或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的某种体验。

笔者认为，“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整体结构或秩序的性质和状态，它生成、发展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是特定人类文明形态下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高度抽象。由于现代社会整体结构又可大致分为社会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结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和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 页。

② [法]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30 页。

④ [英] 安东尼·吉登斯和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 页。

⑤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⑥ [美]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⑦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构,因而它可以区分为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现代性”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社会发展经验的概括,也包括人们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表达和理性判断。

“现代化”则是构筑现代社会的动态过程,亦即现代性在实践层面展开,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充实的过程。对现代性认知的差异,将会导致不同的现代化选择方案和实现路径。从另一角度而言,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也会得到充实、发展,并展现出其独特性。在这层面上,现代性表现为静态的“果”,而现代化则是其动态的“因”。与现代性两种结构相对应,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反映在社会制度结构层次,表现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结构的建构,也反映在文化心理层面,表现为人的价值观以及心理态度和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改变过程。因此,现代化进程就可以简略地表述为社会制度建构与文化心理建构的“两重”建构过程。

总之,对于“现代性”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现代化”等概念,不能仅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而要注重其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因子;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单纯视角或领域,将其视为单纯某一方面的转变,而需要用系统、整体、综合的视角,审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关联。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内涵及建构意义,从而寻求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现代化路径。

二、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义

西方现代性产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启蒙运动高举“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旗帜,是一场反神学、反封建的“祛魅”思想解放运动——打破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以科学理性取代神学信仰和迷信,使人摆脱蒙昧状态。虽然现代性涵盖内容较广,并且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体系,其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时截然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始终贯穿于现代性形成与发展之中。笔者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义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 理性

“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①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作为“祛魅”的基本工具,他们认为人类的灾难、社会的弊病是由愚昧、迷信等非理性行为所导致,因而,倡导以“理性之光”取代“上帝之光”、以“理性的人”取代“全能的上帝”,清除一切非理性、反理性的东西。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在启蒙运动中,

^① [德] E. 卡塞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① 伏尔泰在批判非理性时所宣称：“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②

被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的笛卡儿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天赋的思想能力，提出个人理性可以质疑一切，并以理性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康德在其著名的“三大批判”中对理性的作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认为理性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将其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并试图以理性为认识立法、为道德立法，以确立理性的权威性地位。黑格尔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思想：“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③ 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他给现存事物评判建立了一个理性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④ 黑格尔宣扬“大写的理性”，并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理念”、“世界理性”。“‘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⑤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并将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和非理性两大类，其中合理性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提出要重视价值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成为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当人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时候，这种以自由等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以及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安排，随着价值来源根据的转换，其合理性何在，就成了需要确证的问题。既然设计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据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⑥ 他将理性分为两种维度：一是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行政系统中；二是交往理性，主要体现在生活世界中。

总之，理性成为现代性最基本的要素，被启蒙思想家视为认识之源、价值之源。“现代性的诞生过程可以理解为‘使世界理性化’过程：对自然界的理性化过程产生了现代科学，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则产生了现代生产力体系，对社会生活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6页。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⑤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⑥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